

出土文獻

第七輯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
李學勤主編

中西書局

出土文獻

送書題



第七輯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
李學勤 主編

中西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出土文獻·第七輯/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
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上海:中西書局, 2015.10
ISBN 978-7-5475-0924-1

I. ①出… II. ①李… ②清… III. ①古文獻學—
中國—文集 IV. ①K877.0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227621號

出土文獻 (第七輯)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編 李學勤 主編

責任編輯 田 穎
裝幀設計 梁業禮
出 版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中西書局 (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443號榮科大廈17F(200023)
發 行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
經 銷 各地 新华書店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肖華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張 21
字 數 384000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475-0924-1/K·182
定 價 68.00元

《出土文獻》編輯委員會（以姓氏筆畫為序，帶*者為執行編委）：

李守奎* 李均明* 李學勤* 沈建華* 馬楠* 陳穎飛
彭林 趙平安* 趙桂芳 廖名春 劉國忠*

助編：賈連翔

目 錄

論陶觥及所記史事	李學勤 (1)
談談青銅酒器中所謂三足爵形器的一種別稱	謝明文 (4)
戰國二十七年晉戈銘文考釋	李家浩 (13)
雒陽武庫鍾銘文辨偽	辛德勇 (19)
春秋時期楚國令尹與世族考	陳穎飛 (29)
曾侯乙墓竹簡所見馬車裝備物品綜合分析	羅小華 (42)
《上博二·容成氏》“治亂不共(患)”補議	范常喜 (50)
上博簡《君人者何必安哉》補釋	曹方向 (54)
從出土的《清華簡·皇門》來看清人對《逸周書·皇門》篇的校注	魏慈德 (63)
清華簡《繫年》前四章發微	羅運環 (90)
清華簡《周公之琴舞》“文非易帛”解	石小力 (98)
清華簡《厚父》“天降下民”句的觀念源流與豳公盃銘文再釋 ——兼說先秦“民本”思想的起源問題	寧鎮疆 (103)
論清華簡《厚父》應為《夏書》之一篇	郭永秉 (118)
讀清華簡《湯處於唐丘》中的“設九事之人”	沈建華 (133)
揆中水衡 ——清華簡《殷高宗問於三壽》之中道觀	李均明 (137)
清華簡第五冊字詞考釋	蘇建洲 (145)

略論楚簡文字中的常見類化符號“心”	許 可 (159)
清華簡收捲研究舉例	肖芸曉 (172)
戰國竹書文字佈局小識	賈連翔 (187)
古脉書《足臂十一脉灸經》與《陰陽十一脉灸經》相對年代問題	
考論	趙 争 (193)
銀雀山漢簡“陰陽時令、占候之類”叢札	鄒可晶 (216)
敦煌漢簡 2263《永始四年曆日》復原試擬	許名瑋 (227)
釋金關漢簡中與“過大公”有關的兩枚封檢	劉樂賢 (237)
肩水金關漢簡中的“囚錄”及相關問題	伊 强 (243)
五一廣場東漢簡王皮運送軍糧案續論	劉國忠 (250)
走馬樓吳簡中所見的“宮”	凌文超 (254)
《說文解字》中之闕文研究	
《說文》未收小篆異體再補	周 飛 (267)
試釋“敦”之圓義	陳夢佳 (281)
釋化	陳 瑶 (291)
傳世經部文獻所見脫簡錯簡現象再討論	張德付 (299)
馬 楠 (305)	
知微亦知彰 精深而宏富	
——《初識清華簡》評述	鵬 宇 (319)
文物保護和保存中應遵循的原則	趙桂芳 (323)

論陶觥及所記史事

李學勤

2012年9月中旬，出於偶然機會，看到一件商代晚期的青銅觥，有較長銘文，作器者名陶，仔細觀察，殊有研究價值，隨手寫有筆記。近讀《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6輯朱鳳瀚先生《新見商金文考釋(二篇)》^{〔1〕}，已對此器作了深入詳細的討論，並有器形照片和銘文影本、摹本。朱文有好幾點足以糾正我過去的誤解，我的想法或也有可作朱文補充之處，因此將原寫筆記修改，供大家參考商榷。

陶觥是一件製作精細的素觥，其形制、裝飾均類似容庚先生《商周彝器通考》679觥，特別是其流部較短，不太向前伸出。觥通體呈淡青色銹，高28釐米，長30.9釐米，保存狀況良好。觥蓋前端為有“瓶形”角的龍首，角的內側有小橫突起。龍耳外伸，右耳舊已折損。蓋的上部飾披角的牛首，蓋身佈以鱗紋，下方有垂珥。低圈足，足上有兩道弦紋，足內器的外底沒有網格狀綫紋。

觥係蓋器對銘，銘文有4行39字，在商代銘文中算不得最長，但如以蓋器合計，就達78字了。下面試依器銘行款寫定，然後略加解釋：

癸亥，小臣晡易(錫)百工，王乍(作)
冊毘友、小夫麗，易(錫)圭一、
璧一、璋(璋)五，陶(陶)用乍(作)上且(祖)癸
璋彝。佳(惟)王曰：“嗣”，才(在)九月。或。

“癸亥……在九月”，是商代常見的紀時格式，即九月癸亥日，卜辭銘文都有，不煩舉例。

“小臣”在商代卜辭銘文中意即臣下的臣，是相對於君王的稱呼。其實際身份或

〔1〕朱鳳瀚：《新見商金文考釋(二篇)》，《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6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高或低，“有的地位很高，僅次於王”〔1〕，觥銘中的這個“小臣晡”正是這樣。其人名“晡”，字從“且”從“甫”，在古文字中首見。

“百”字沒有上端一橫，是比較原始的寫法。“百工”一詞，見《尚書·堯典》等篇，即指朝中百官。小臣晡有資格賞賜百官，可見他當時有特殊尊貴的地位。

“作册”，大家瞭解是史官，“毘”是該人的名字。他在銘文中特標為“王作册”，係表明他是王的史官，並非小臣晡私家的臣屬。“友”在此意思是同僚，“王作册友”相當於《尚書·酒誥》的“太史友、內史友”，毛公鼎的“大(太)史寮(僚)”。“小夫”，詞見《商君書·境內篇》及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2〕指身份較低的屬員。“麗”讀為“果”，意思是侍，習見於商末周初銘文。〔3〕“王作册毘友、小夫麗”，是說王朝史官毘和他的僚屬都到場服事。小臣晡賞賜百官，有史官服務，說明這是商王朝一次盛典，非比尋常。

毘及他的僚屬參預這次活動，也得到賞賜，計有圭、璧、璋等禮玉共七件。

“陶”即“陶”字，〔4〕為觥的器主之名。看上下文，他應該是作册毘同僚中的重要成員，因而分享到小臣晡的賞賜，作這件觥祭祀先人“上祖癸”，以為紀念。

“上祖癸”是器主陶先人世系中第一位祖癸，故而加區別字“上”，例如殷墟卜辭有“上甲”、“上乙”等稱謂。在青銅器銘文裏，用“上”作區別字前所未見。

“惟王曰嗣”，記於銘文末尾，也是商代至周初的習慣文例。“曰”字寫成“口”形，省去一筆，裘錫圭先生曾有詳論。〔5〕

“嗣”義為嗣位。前王逝世，新王宣告嗣位，故云“惟王曰嗣”。由這一句，可知觥銘所記的是繼嗣王位的典禮。

《尚書》中的《顧命》(或分為《顧命》、《康王之誥》)記述周成王病卒，康王嗣位的典禮，是由大臣召公來主持的，“時周公已歿，召公最為元老重臣，故治喪及命新王，皆由召公主之。”〔6〕殷周禮制相因，觥銘小臣晡的身份應與之相類。

值得注意的是《顧命》記載中史官在行禮間有重要作用，即：“太史秉書，由賓階墜，御王册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

〔1〕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第59頁，中華書局1988年。

〔2〕《雲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雲夢睡虎地秦墓》，圖版一一六，732，文物出版社1981年。西周早期小夫卣銘文“小夫”則係人名，見《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1099。

〔3〕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第145頁，中華書局1997年。

〔4〕容庚：《金文編》第942頁，中華書局1985年。

〔5〕裘錫圭：《關於殷墟卜辭中的所謂“廿祀”和“廿司”》，《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一卷，第467—472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參看李學勤：《談寢斲方鼎所謂“惟王廿祀”》，《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6期。新出版的《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210：“王曰祀，其祀其邁又(侑)，王受又。(有祐)”，“曰”字也作“口”形。

〔6〕屈萬里：《尚書集釋》第234頁，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

文武之光訓。”從這裏，我們也可以推想觥銘裏的作冊毘及其僚屬在典禮中的角色。

瞭解了陶觥銘文所記是商王嗣位的典禮，考慮觥的形制屬於商末，其銘文的風格也指示這一點，那麼典禮內新嗣位的商王最可能是帝辛(紂)。

這裏還需要討論觥銘最後的“或”字。此字綴於銘尾，應係器主陶的族氏，但寫法不像常見族氏那樣美術化。“或”這一族氏見於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對商周之際的方鼎(《殷周金文集成》2133、2134)，其銘文云：

作父癸
罍彝。或。

沒有器主之名。值得注意的是，方鼎的“或”字形狀和陶觥的非常相似。

《集成》9095 是一件西周早期的爵，其銘文是：

呂仲僕作毓子
寶罍彝。或。

器主大約是當時在姜姓呂國的該族氏之人。“毓子”可讀為《尚書·舜典》的“胄子”。

《集成》5430 是也在上海博物館的繁卣，時代為西周中期前段，有較長銘文，其最後是：

……用作文考辛公
寶罍彝，其萬年寶。或。

“或”字寫得與同銘各字樣子並沒有什麼區別。

從上述各例，我們知道，陶觥器主所屬的“或”這一族氏，直到西周中期依然存在。大家了解，西周中期以下，在銘文中標出族氏的風氣已經幾乎消失，“或”這一事例已可說是特別晚的了。

需要附帶說明的是，殷墟卜辭黃組裏的“王曰：‘司’”和觥銘的“惟王曰：‘嗣’”恐怕不是一回事，因為那些卜辭有九月癸未、九月癸巳，^[1]這與觥銘的九月癸亥無法兼容，除非加一個閏月。

2013年2月12日初稿

2015年5月31日修改

(李學勤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出土
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教授)

[1] 裘錫圭：《關於殷墟卜辭中的所謂“廿祀”和“廿司”》，《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一卷，第467—472頁。

談談青銅酒器中所謂三足 爵形器的一種別稱*

謝明文

宋人所謂觶這一類青銅酒器的自名問題，我們曾經專門著文討論過。^{〔1〕}那麼同是青銅酒器的所謂爵形器的自名情況又如何呢？商周古文字中有“𣎵”（《合》22184）、“𣎵”（爵匄父癸觶，《集成》09285）等形，^{〔2〕}它們是爵形器的真實寫照，研究者一般釋作“爵”，^{〔3〕}可從。然而在目前已經公佈的資料中，並沒有發現一例確定無疑的“爵”字用作爵形器自名的例子。^{〔4〕}我們認為這可能跟爵銘大都比較簡短，且爵銘帶自名的例子本來就極其稀少有關。隨着新資料的發表，將來應會出現爵形器自名“爵”的例子。本文我們則準備重點談談爵形器的另一種別稱。

史獸鼎（《集成》02778）是一件西周早期器，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其內壁鑄銘文50字，銘文為：

尹令史獸立（涖）工（功）于成周。十又二月^{〔5〕}癸未，史獸獻工（功）于

* 本文受到2013年復旦大學新進校青年教師科研啓動資助項目“商周金文字詞考釋”（批准號JJH3148005）的資助。

〔1〕 謝明文：《談談金文中宋人所謂“觶”的自名》，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4年12月25日，http://www.gwz.fudan.edu.cn/ SrcShow.asp? Src_ID=2406。

〔2〕 參看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第1065—1066頁，中華書局1989年。董蓮池：《新金文編》上冊，第642頁，作家出版社2011年。

〔3〕 參看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第2760號，第2743—2747頁，中華書局1996年。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第677號，第3344—3353頁，香港中文大學1975年。

〔4〕 魯侯爵（《集成》09096）“𣎵”，一般認為是自名（也有研究者認為爵銘中的“𣎵”才是自名），有不少研究者釋作“爵”。此字頭部與“爵”有別，應非“爵”字，有研究者或認為是“觶”字初文，這有可能是正確的。

〔5〕 “𣎵”，舊皆釋作“一月”，我們認為從該銘全篇佈局以及月字頂端筆畫來看，似宜看作“二月”合文。

尹，咸獻工(功)，尹賞史獸裸(瓚)，易(錫)豕〔1〕鼎一、△一，對揚皇尹不(丕)顯休，用乍(作)父庚永寶罍(尊)彝。

其中△字，原作“𣪠”。丁佛言認為：“疑古爵字，從𣪠從西省從止，戒荒飲也。或曰：𣪠象稱觴之形。”〔2〕《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討論△字時說：“從止從𣪠，𣪠即是爵的象形字，上像柱，中像流，下像爵腹與爵足。從止，止是足形，代表人在行走。古代舉行飲酒的典禮時，用爵來酌酒，依次序來使人飲，稱為‘行爵’。𣪠本義當是行爵，此處仍當酒器的爵講。”〔3〕《金文形義通解》釋作爵，認為增從止，正文中把它摹作“𣪠”，檢索表中把它摹寫作“𣪠”。〔4〕《銘圖》02423 釋作“罍(爵)”，〔5〕《商周金文摹釋總集》把此字摹作“𣪠”，亦釋作“罍(爵)”。〔6〕四版《金文編》〔7〕、《北京圖書館藏青銅器銘文拓本選編》〔8〕、《西周銅器斷代》〔9〕、《商周青銅器銘文選》〔10〕、《殷周金文集成引得》〔11〕、《殷周金文集成釋文》〔12〕、《故宮西周金文錄》〔13〕、《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14〕、《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15〕、《說文新證》〔16〕、《新金文編》〔17〕、《讀〈楚系簡帛文字編〉》〔18〕、《論包山簡的“會懸之觴”——兼說“爵”的形制》〔19〕、《遼簋銘文中的“爵”字補釋》〔20〕等皆徑釋作“爵”。總之，從已有的相關研究

〔1〕此字一般釋作“豕”，有個別研究者釋作“方”。從拓本看，雖似“方”字，但是從下引《故宮西周金文錄》所錄銘文照片來看，應是“豕”字。

〔2〕參看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第3349頁，香港中文大學1975年。

〔3〕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第141頁，中華書局1986年。

〔4〕張世超等著《金文形義通解》第1289頁0823號、第3573頁，中文出版社1996年。

〔5〕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5冊，第24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6〕張桂光主編：《商周金文摹釋總集》第2冊，第418頁，中華書局2010年。

〔7〕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第356頁，中華書局1985年。

〔8〕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青銅器銘文拓本選編》釋文部分，第5頁，文物出版社1985年。

〔9〕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第90頁，中華書局2004年。

〔10〕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3冊，第91頁，文物出版社1988年。

〔11〕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第48頁，中華書局2001年。

〔1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2卷，第356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

〔13〕臺北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故宮西周金文錄》第208頁，臺北故宮博物院2001年。

〔1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2冊，第1445頁，中華書局2007年。

〔15〕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第334頁，綏裝書局2008年。

〔16〕季旭昇：《說文新證》第445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



〔17〕董蓮池：《新金文編》上册，第642頁。


〔18〕李零：《讀〈楚系簡帛文字編〉》，《出土文獻研究》第五集，第155頁第216條，科學出版社1999年。

〔19〕何景成：《論包山簡的“會懸之觴”——兼說“爵”的形制》，《古文字學論稿》第385頁，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

〔20〕周忠兵：《遼簋銘文中的“爵”字補釋》，《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紀念論文集》第5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來看,把△字釋作“爵”或讀作“爵”顯然已經成了目前被廣泛接受的說法。

△字上部是“爵”,最下部是“止”,這些皆無疑問。但從拓本字形看,“止”形與“爵”形中間很明顯還有一圓點,把△字隸作“壘”,顯然是忽視了這一圓點,故把此字隸作“壘”絕不可信。“正”字從止從城之初文“口”,“口”亦可演變作一圓點。^{〔1〕}因此我們認為△字“爵”形下的這一圓點應與止形結合,即“正”字。《故宮西周金文錄》著錄了史獸鼎的銘文照片,^{〔2〕}其中△字作“ (壘)”,爵形下的部分作“ (止)”,可確定它必是“正”字無疑。因此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字當釋作“壘”,舊把△字徑釋作“爵”或讀作“爵”都難以解釋它為何從“正”。《說文》:“觴,觶實曰觴,虛曰觶。从角、殸省聲。甕,籀文觴从爵省。”金文中“觴”作“觴”,見於觴仲鼎(《新收》707)、觴姬簋蓋(《集成》03945)、觴仲多壺(《集成》09572)等。或作“鬪”,見於晉公盤。^{〔3〕}它們從爵不省、從易或揚聲。根據古漢字字形結構的一般規律以及參照“觴”字異體“觴”、“鬪”來看,△字最自然直接的分析應是從爵、正聲。從這一點看,舊把△字徑釋作“爵”或讀作“爵”恐怕都是有問題的。

山西翼城縣大河口西周墓地 M1 出土了一批燕侯旨所作器物,其中有兩件燕侯旨所作銅爵,該墓地發掘者在發掘報告中披露其銘文內容為“旨作父辛爵世”,但沒有公佈銘文照片、拓本。^{〔4〕}劉樹滿先生、李寶軍先生關於旨爵的釋文與發掘者所作釋文相同。^{〔5〕}馮時先生關於燕侯旨爵的釋文為“旨乍(作)父辛爵世(?)”,^{〔6〕}可見馮先生對“世”字的釋讀表示懷疑。新近出版的《呦呦鹿鳴:燕國公主眼裏的霸國》一書公佈了這兩件旨爵(下文用 A、B 來區分這兩件旨爵)的彩色照片,且提及它們柱面有銘文“旨作”,鑿後腹部有銘文“父辛爵世”。^{〔7〕}從這兩件旨爵的彩色照片來看,旨爵 B 銘文不可見,但旨爵 A 鑿後腹部的所謂“爵世”二字還能辨析,它們原作“”(爵)。首都博物館“千古探秘——考古與發現”展(2009年8月18日—11月30日)曾展出過一

〔1〕董蓮池:《新金文編》上冊,第154—155頁。

〔2〕臺北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故宮西周金文錄》第29頁,臺北故宮博物院2001年。







〔3〕吳鎮烽:《晉公盤與晉公盂銘文對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4年6月22日,http://www.gwz.fudan.edu.cn/ SrcShow.asp? Src_ID=2297。

〔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口墓地聯合考古隊:《山西翼城縣大河口西周墓地》,《考古》2011年第7期,第12頁。




〔5〕劉樹滿:《霸國、邶國青銅器整理與研究》第20頁,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李寶軍:《西周早期的召公家族世系——以青銅器銘文為中心的考察》,《洛陽考古》2013年第3期,第65頁。

〔6〕馮時:《霸國考》,《西周封國論衡:陝西韓城出土芮國文物暨周代封國考古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38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首都博物館編:《呦呦鹿鳴:燕國公主眼裏的霸國》第62—63頁,科學出版社2014年。

件旨爵(可能是旨爵 B),網上曾發佈過它的彩色照片,〔1〕所謂“爵世”原作“ (世)”,其中“爵”字更完整。從上述彩照看,所謂“世”字明顯下部是“止”形,但“止”形上方還有一圓圈形與止形的中間那一筆相連,作“ (世)”、“ (世)”形,此顯然是“正”字。我從同好處獲得了旨爵 A 鋈後腹部不完整的銘文拓本,作“ ”。“父辛”左側之字作“”,該拓本雖然不全,但“爵”形非常清晰。“止”形儘管幾乎不可見,但“止”形上的圈形則清晰可見,作“ (世)”。再結合上引旨爵 A 鋈後腹部的銘文照片來看,可以肯定“爵”下所謂“世”字必是“正”字之誤釋。上引旨爵銘文中,“正”與“爵”兩形排列緊密,且“正”字頭部的圈形筆畫完全處於爵字底端表示足部的兩豎畫之間,因此“爵正”似當作為一字處理。又聯繫史獸鼎△字來看,我們認為旨爵銘文中舊所謂的“爵世”與△字顯然是一字異體,亦當釋作“壘”。因此旨爵鋈後腹部的銘文當釋作“父辛壘”,它與柱面銘文“旨乍(作)”應連讀作“旨乍(作)父辛壘”。

單從銘文位置看,旨爵銘文中的“壘”既可能作族名或父辛私名,也可能是器物自名。但根據“壘”在甲骨文、金文中皆沒有用作族名、私名之例,又旨爵銘文中的這位父辛已多次見於金文,其後皆無帶私名之例,如燕侯旨鼎(《集成》02269)“燕侯旨作父辛尊”、旨壺(《吉金御賞》第 76—79 頁,御雅居 2012 年)“旨作父辛彝”、伯蘇鼎(《集成》02407)“伯蘇作召伯父辛寶尊鼎”、憲鼎(《集成》02749)“用作召伯父辛寶尊彝”、伯憲盃(《集成》09430)“伯憲作召伯父辛寶尊彝”、蘇爵(《集成》09089)“蘇作召伯父辛寶尊彝”等,另又聯繫史獸鼎△字的用法來看,我們認為旨爵的“壘”應該就是該爵的自名,也就是說爵形器應有一種別名是稱作“壘”。

古文字資料中的“鬻/甞”,研究者或認為它是“鬲”的別稱(參看下文),如果此說可信,則“壘”、“爵”的關係與“鬻/甞”、“鬲”的關係恰好相類。壘鬲(《集成》00633)自名作“”,郭沫若先生指出即《玉篇》釋為“大鼎也”、《廣雅·釋器》釋為“鼎也”之“鬻”字。琯生鬲(《集成》00744)自名作“”,孫稚雛先生指出即“鬻”字之異體。師趁鬲(《集成》00745)自名作“”,則是借“鬻”為“鬻”。〔2〕以上三器皆是鬲而自稱“鬻”,我們認為“鬻”最初很可能也是鬲的別稱。如果此說可信,則“壘”、“爵”的關係與“鬻”、

〔1〕參看網友空谷聽風日志《首都博物館“千古探秘——考古與發現”展(三)》,2009 年 9 月 23 日,http://wzqwang263net.blog.163.com/blog/static/55027902200982311412499/。

〔2〕以上參看張世超等著:《金文形義通解》第 597—598 頁,中文出版社 1996 年。

“鬲”的關係亦相類。金文中的簠類器一般以古聲字或夫聲字爲自名，〔1〕但亦有以“匡”爲自名者，如尹氏叔簠（《集成》04527）、師麻孝叔簠（《集成》04555）、史免簠（《集成》04579）等，“匡（簠）”、“匡”亦可連稱，如曹公簠（《集成》04593）、蔡侯簠（《銘圖》05933、05934）、陳公子仲慶簠（《集成》04597）之“匡（簠）匡（簠）”。“匡”當是“匡（簠）”的別稱。盞，朱鳳瀚先生認爲是西周中晚期對盃的一種異稱，〔2〕陳劍先生認爲是盃的別名或方言的不同。〔3〕“鼎”有一類自名，常假借“鬻”字爲之，或假借“反”聲字爲之，或造專字“鬻”（鄧公乘鼎，《集成》02573）爲之。“鬻”、“鼎”亦可連稱。“鬻”應是東周時期江淮流域的南方諸國對鼎的一種別稱。〔4〕由此可見，同一器類可以有不同的別稱，那麼我們說“爵”有別稱作“壺”，這也是比較自然的。

從旨爵自名“壺”來看，以往的研究者把史獸鼎△字徑釋作“爵”或讀作“爵”雖然不對，但對其文義的理解却是正確的。“易（錫）豕鼎一、△一”即“尹賞賜史獸一件豕鼎，一件壺”，“壺”是“爵”的別稱，“賞賜一件壺”其意即“賞賜一件青銅爵”。

清華簡《封許之命》敘述周成王賞賜呂丁一組薦彝，相關簡文如下：〔5〕

贈尔薦（薦）彝，鬻□豚𦉳，龍盞（鬻）、繅（璉）、萑（鐘）、鉦、耆勺、盤、監（鑑）、鏦（盞）、罍、周（雕）匡（匡）、鼎（鼎）、盞（盞）、針（觥）、錫（旨）、恣（格）。

“盞”，整理者讀爲“鬻”，或說即“鬲”字。我們認爲或說可從。東周古文字中的“羹”字，〔6〕徐王糧鼎（《集成》02675）作“𦉳”，《曹沫之陳》簡 11 作“𦉳”，後者下部省變作“皿”。乃孫鼎（《集成》02431）“鬻”作“𦉳”，賢簠（《集成》04104）銘文中有以之爲偏旁的字作“𦉳”，後者下部作“皿”形。“煮”字，子湯鼎（《銘圖》02039、《新收》1310）作“𦉳”，叔夜鼎（《集成》02646）則作“𦉳”。“湯鼎”之“湯”，彭子射鼎（《文物》

〔1〕參看李學勤：《青銅器中的簠與鋪》，《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第 76—81 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4 年。

〔2〕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冊）第 298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

〔3〕陳劍：《青銅器自名代稱、連稱研究》第 348 頁，《中國文字研究》第 1 輯第 348 頁，廣西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4〕參看趙平安：《從語源學的角度看東周時期鼎的一類別名》，《金文釋讀與文明探索》第 124—132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

〔5〕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圖版見該書第 37—44 頁，釋文、注釋見該書第 117—123 頁，中西書局 2015 年。下引整理者說皆出自此文，不再出注。

〔6〕陳劍：《釋上博竹書和春秋金文的“羹”字異體》，2007 年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2007 年 11 月 10—11 日；又發表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8 年 1 月 6 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x?Src_ID=295。收入同作者《戰國竹書論集》第 231—260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

2011年第3期第8頁圖6.2—3,《銘圖》01667)作“𠄎”,彭公之孫無所鼎(《中原文物》2004年第2期第47頁,《銘圖》02158)作“𠄎”。“𠄎”(叔原父甗,《集成》00947)字異體或從皿作“𠄎”(王孫叔謹甗,《銘圖》03362)。因此據以上諸形,可知簡文“盥”與樊君鬲(《集成》00626)“𠄎”當是一字異體,即從圭從鬲(鬲)之字異體,可釋作“鬲/𠄎”。“𠄎”,古文字資料中多次出現,研究者或認為它是在鬲上加注“圭”聲,^[1]或認為它是“鬲”的別稱。^[2]我們認為簡文中的“盥”當與樊君鬲的“𠄎”用法相同,亦是指鬲而言。

“匱”,整理者讀爲“匚”。我們認為它應讀爲“匡”或“匡(簠)”(“匡”、“匡”音義皆近)。《說文》:“匚,受物之器。象形。凡匚之屬皆从匚。讀若方。匚,籀文匚。”甲骨、金文中的“匚”,主要有兩種用法,一種用法是用作“報”,一種用法是用作器名“匡”或“匡(簠)”。這兩種用法的“匚”最初可能就是共用一形,也可能彼此來源不同,後來才混同爲一,我們傾向後者。西周早期的匚爵(《集成》09058)有人名或族名用字作“匚”,研究者或釋作“匚”。如果此說可信,再結合金文中多見的“匚”字來看,^[3]我們認為後者所從的“匚”實即前者所從“匚”之省。而“匚”正是簠類器的象形,它即簠類器正視與側視之結合。仲妃衛簠(《近出》525,《新收》400,《銘圖》05927)自名作“匚”,我們認為它應是比較原始的“匚”類形省略右邊一豎演變而來,銘文中用的正是其本義。從上古漢語看,不少唇音字與牙音字關係密切。^[4]因此我們認為《說文》匚讀若方,該音應該就是源於用作“匡”的“匚”。讀若方的“匚”最初應該就是表示簠類器自名的“匡”的初文“匚”類形之省,“匡”則是在“匚”上加注“圭”聲而產生的形聲字。“匡”應分析爲從金、匚(匚)聲,金文中作爲器物自名見於京叔姬簠(《集成》04504)、仲其父簠(《集成》04482)、仲其父簠(《集成》04483),它指的就是青銅器中習見的那類作長方形、斗狀、器蓋同形的簠類器。匚、簠因爲皆可作爲盛黍稷的器皿,功能有相近之處,故金文中兩者可以器名連稱,如宰獸簠(《新

[1]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第134頁注3。郭永秉:《釋上博藏西周寓鼎銘文中的“羹”字——兼爲春秋金文、戰國楚簡中的“羹”字祛疑》,《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第1—2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2] 施謝捷:《首陽齋藏子犯鬲銘補釋》,《中國古代青銅器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第283—290頁,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10年。

[3] 董蓮池:《新金文編》上册,第197—198頁。

[4] 李家浩:《讀〈郭店楚墓竹簡〉瑣議》,《中國哲學》第二十輯,第339—355頁,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劉釗:《談新公佈的牛距骨刻辭》,《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7期。謝明文:《說腹、飽》(未刊稿)。

收》663、《銘圖》05377)、宰獸簋(《新收》664、《銘圖》05376)“用作朕烈祖幽仲益姜寶匱簋”之“匱簋”即其例。簡文匱與鼎、簋並列,它顯然與金文中的匱用法相同,指的亦應是青銅器中習見的簋類器。〔1〕

青銅器中有自名“藿”、“鑷”者,我們曾專門予以討論,認為“鑷”應是西周當時用來稱呼宋人所謂觶的那類器物的專名。〔2〕上引《封許之命》簡文中的“藿”,整理者把它與我們曾討論過的伯飲鑷(《銘圖》10855)之“鑷”相聯繫,鵬宇先生贊同此說並對相關問題作了補充。〔3〕我們認為整理者關於簡文“藿”的意見可信。

“鉦”,整理者讀為“盞”,認為係一種盆形容器。西替盆(《集成》03710)“西替作其妹斲鑿鉦鎗”之“鉦”,李家浩先生曾讀為“盞”。〔4〕此兩說乍看似可互證。但西替盆的“鉦”,我們認為宜讀為“征行”之“征”。〔5〕而簡文“鉦”,從上下文來看,讀作“盞”亦不可信。

從上引簡文來看,周成王賞賜呂丁的這一組薦彝,其內部排列大體依類相從。如“盥(甗)”、“繅(璉)”皆是食器。“盤”、“監(鑿)”、“鑿(鑿)”皆是水器,“罍”是壺屬,〔6〕壺既可以作為酒器,也可以作為水器,〔7〕故“罍”次於“盤”、“監(鑿)”、“鑿(鑿)”之後。“匱(簋)”、“鼎(鼎)”、“盤(簋)”皆是食器,“鉞(觥)”、“鎔(卣)”皆是酒器。“藿(鑷)”是宋人所謂觶這一類酒器,“鉦”排列於其後,再結合它是“薦彝”之屬來看,簡文“鉦”應當是酒器之屬而非樂器“鉦”。“鉦”從“正”聲,“鑿”亦從“正”聲,又它們皆為酒器之屬,因此我們認

〔1〕研究者一般認為青銅簋始出現在西周中後期,但從目前的資料看,此說有待修正。故宮博物院曾收藏一件青銅簋,研究者認為應屬於西周早期(故宮博物院編:《故宮青銅器》第142頁,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杜迺松:《青銅器概論——故宮博物院文物珍品青銅器導言》,《文物春秋》2008年第5期,第6—7頁)。另2013年石鼓山M4的南邊壁龕K8中,出土了兩件青銅簋,亦是西周早期器(上海博物館編:《周野鹿鳴:寶雞石鼓山西周貴族墓出土青銅器》第112—115頁,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年)。因此簡文的匱指簋類器,從時代方面看並不奇怪。如果我們關於簡文匱的意見可信,這可說明《封許之命》確有較早的來源。

〔2〕謝明文:《談談金文中宋人所謂“觶”的自名》,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4年12月25日,http://www.gwz.fudan.edu.cn/ SrcShow.asp? Src_ID=2406。

〔3〕鵬宇:《清華簡〈封許之命〉“薦彝”與商周觶形器再探討》,清華簡與儒家經典專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第222—227頁,煙臺,2014年12月。

〔4〕李家浩:《葛陵村楚簡中的“句卣”》,《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 李家浩卷》第273頁,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此為鄔可晶先生提示,謹致謝忱。

〔5〕謝明文(原署名謝雨田):《新出登鐸銘文小考》文後評論第2樓,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3年9月12日,http://www.gwz.fudan.edu.cn/ SrcShow.asp? Src_ID=2111。

〔6〕參看李家浩:《談古代的酒器鑿》,《古文字研究》第24輯,第454—458頁,中華書局2002年。徐在國:《蒿子壺壺銘文解釋》,《中國文字研究》第19輯,第20—23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

〔7〕參看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册)第224頁。

